

委员风采

创新以商招商模式 打造面向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访市政协委员、广西双荣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桂林绍兴商会会长陈照明



□本报记者张婷婷 文/摄

“过去招商我们是引资金，现在招商我们引‘未来’。”市政协委员、广西双荣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桂林绍兴商会会长陈照明说，去年底他引进的云端机器人项目，不仅仅是引进了一个企业落地，更是桂林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突破。通过以商招商，构建一个开放协同的创新生态，让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在桂林集聚。

云端机器人项目是陈照明创新以

招商模式，践行“生态化招商”新理念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陈照明充分发挥商会会长的桥梁纽带作用，将“以商招商”从简单的项目引进，提升为产业生态的构建与优化。在实践中，他主导构建了“三位一体”的招商体系：以龙头企业为“链主”把准方向，以会员企业为“推介团”现身说法，以商会秘书处为“服务组”全程护航。这一模式不仅极大提升了招商效率，更确保了项目的精准落地和可持续发展。

云端机器人项目从对接洽谈到

正式签约仅用了28天，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桂林速度”，将于下个月月底正式投产。“更可喜的是企业落地后，已经与多所高校及中小学达成在人工智能产教融合方面的合作意向，这也正是科技自立自强在桂林的生动体现。”陈照明说，作为市政协委员，他深感招商工作必须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地方高质量发展全局，要为桂林引入更多与环境共生、与产业共融的未来型企业，共同打造面向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践行“一帮一助” 助力高质量招商

——访市政协委员、桂林融和企业家服务中心会长、桂林力通开关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培丰



□本报记者张婷婷 文/摄

“作为共青团界别的政协委员和桂林融和企业家服务中心会长，我充分发挥企业优势与专业特长，积极践行‘一帮一助’以商招商理念，努力为桂林产业振兴贡献力量。”桂林力通开关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培丰说。

2021年11月，胡培丰创立桂林融和企业家服务中心，秉持

“一帮一助”服务宗旨，为企业搭建平台、协助政府招商。去年，他先后3次赴大湾区、2次到浙江等地协助政府招商，搭建佛山温州商会与桂林灵川县政府招商团队的交流平台；组建“一帮一助”招商小分队，两度前往广州、深圳等地，围绕光通信产业拜访当地协会和企业。自服务中心创立以来，共邀请了500多位商协会企业家来桂林考察，去年还承办了自治区工信厅主办的在七星区举行的光通信产业招商

推介会，成功签约招商2个项目。完成考察与签约后，胡培丰认真做好跟踪服务，全力推动项目落地，助力桂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此外，他积极投身公益活动，履行社会责任。疫情期间，他动员156位爱心人士捐款6万多元用于抗疫；发动企业家捐资7万元修建融和路，改善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多次组织协会会员到乡村小学开展助学活动，看望慰问孤寡老人，传递社会的关爱与温暖。

(上接第一版)文旅业态不断创新，成功举办烟雨马拉松、新春焰火秀等大型活动，推出“桂林有戏”沉浸式演艺项目，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文化旅游等新兴业态。红色旅游焕发活力，以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为契机积极挖掘桂林湘江战役、文化抗战等历史文化遗产，持续打造精品力作擦亮红色IP，精品剧目《龙隐居》广获好评，央视热播剧《阵地》成功掀起“跟着剧情打卡”热潮，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今年国庆假期游客接待量达2.82万人次，同比去年国庆增长34%。

——科创能成为新引擎。充分发挥桂林比较优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科创桂林”，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落地广西首个全国产业化商用大模型“桂林版昇腾DeepSeek”，推出广西首个行政审批智能体“漓政通”，建成“AI桂林”文旅大模型，工业领域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产值超30亿元。积极打造创新平台，新认定广西重点实验室6家，累计建成49家，占全区近30%；与浙江大学共建“一联盟一中心一基金一体系”新型科创模式，建设桂林启真联合创新概念验证中心；成功举办第六届中国新材料产业发展大会、第三届世界材料大会，推动形成金属新材料、电子信息材料等特色产业集群，新材料产业工业总产值已突破200亿元。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成立桂林市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联盟，全市获2024年度广西科学技术奖42项，占全区26%；3项成果入选广西首批最具代表性的10项科创“首字号”成果；6个产品获认定为广西区内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占全区1/3。扎实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新增广西智能制造标杆企业4家、数字化车间13家，培育国家级单项冠军2家；全球首艘生物乙醇制氢船舶在漓江试航；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提升至37%。

——县域发展呈现新亮点。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全市实施设施农业项目15个，设施农业总产值达224.45亿元。恭城月柿、阳朔金桔入围中国区域品牌价值百强榜，资源黄牛、平乐慈姑等5个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实施乡村建设项目1035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增幅全区第一。因地制宜发展县域工业，龙胜滑石突破多项技术壁垒进军高端领域应用，灵川桂林新材料项目挺进新能源赛道，七星、临桂

等地80多家专精特新和“小巨人”企业集聚，各县(市、区)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我市县域特色产业数量、支撑项目数量等均居全区第一。积极争创县域试点示范，雁山区获批2025年广西县域商业建设试点县，阳朔县成为国家乡村振兴联系点，全市共创建灵川县、阳朔县和资源县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数量居全区第一。

——城市品质实现新跃升。统筹推进城市更新与精细化管理，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宜居水平，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城市空间更加美好。开展“六大周边”专项整治，全国文明城市、全国卫生城市建设成果持续巩固。桂林外环高速、桂钟高速等项目进一步加快建设；134个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全部开工，城市地下管网及设施建设改造持续推进，储备75个管网建设项目，谋划市本级市政基础设施项目30个，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问题处置率达99.97%，智慧城市圈建成投用，两项经验做法入选全国第二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获全国推广。

——对外开放迈出新步伐。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成功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联合国旅游组织/亚太旅游协会旅游趋势与展望大会等国际会议活动，成功承办中国—东盟建设部长圆桌会议、中国—东盟市长论坛，启动中越跨境旅游合作交流活动，成功接棒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举办权，桂林开放合作“朋友圈”不断拓展。不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国内20座城市合作发布入境旅游联程路线产品，协调多家航空公司恢复、加密国内重点客源地航线，同时恢复桂林至马来西亚吉隆坡、中国香港、韩国首尔等国际及地区航线。据初步测算，今年1—9月，全市接待入境过夜游客105.19万人次，同比增长81.0%，占全区74.5%。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中流击水，勇进者胜。在建设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的伟大征程上，桂林将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力争一批重大政策、重大事项、重大项目早日落地见效，持续唱响高质量发展主旋律，推动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奋进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桂林篇章。

看《阵地》说桂林
系列报道之十一

□本报记者苏展

在央视热播剧《阵地》中，桂林七星岩壁上“敌人在轰炸，我们在上课！”的宣言震撼人心。这句穿越时空的呐喊，将人们的思绪带回到抗战时期新安旅行团在桂林的峥嵘岁月。

1938年11月，新安旅行团从长沙转移至桂林，在这座抗战文化城，他们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岩洞教育”的特殊使命。而这一切，都与一位名叫汪达之的教育工作者紧密相连。

矢志教育救国

组建团体开展抗日救亡

汪达之1903年出生于安徽安庆，父亲在他出生前去世，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母亲一人身上。虽然家庭生活十分艰难，但是母亲坚持要子女们都去上学。

汪达之小学毕业后，考上省立第一师范，后转到省立第一中学。1925年，汪达之中学毕业，母亲要他去考大学，他却和几个同学在中国共产党员姚佐元的发起下，组织了一个“会社”。没过多久，他们的活动被反动当局发觉，有的同伴被捕杀，汪达之随后转移到南昌、望江等地任小学教师。

1927年，汪达之从姚佐元寄给他的信件中得知陶行知在南京劳山下办晓庄师范。汪达之立志要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奋斗，于是便去报考晓庄师范，最终被录取。1929年，江苏淮安新安会馆创办新安小学，陶行知派汪达之等人去主持新安小学的工作。

1933年秋，汪达之按照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办学，将学校仅有的7名基本学生组成“新安儿童自动旅行团”，让学生们走出校园，去认识社会和学会解决自身经历的各种困难。该旅行团到过镇江和上海，50多天的活动，轰动了上海各界。

“新安儿童自动旅行团”上海之行获得成功后，汪达之在陶行知和一些教师团体的全力支持下，开始构思一个规模更大、活动范围更广的团体，其作用是一边践行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理论，一边到全国各地去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这个团体就是后来的新安旅行团。

1935年10月10日，新安旅行团成立后从江苏淮安出发，汪达之以“顾问团员”的身份，率领新安小学的14名团员，携带一套电影放映工具和《一·二八战地写真》《民族史诗》等抗日影片，开始了他们新的征程。他们由华东到华北，又由华北到西北，辗转到达武汉，于1938年11月来到桂林。

践行生活教育 铸就战时英才

新安旅行团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



▲位于桂林解放桥六匹马码头附近的新安旅行团纪念墙。记者苏展 摄

领导的宣传抗日救国的青少年文艺团体。汪达之在《我自新旅来》的文章中提到，该团体的特点是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密切结合，边学习边开展工作。

新安旅行团既是团体也是学校，他们学习的内容与一般学校有所不同，除了中小学的文化课之外，还有开展工作时所需要的艺术课，如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等，年龄大的团员还要学习社会科学和政治理论。

该团体的学习形式实行“小先生制”，能者为师，互教共学，同时也请团外的人来上大课。团员学习的自觉性强，一般都能讲、能写、能画、能演、能歌善舞，还要做群众工作，综合素质超过一般学校同龄的学生。汪达之当时是该学校的顾问和组织者。

在桂林期间，新安旅行团积极开展“岩洞教育”，参加“保卫大西南”的宣传，组织了“桂林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在甲山致和村恢复了新安小学，还先后派出了乡村工作队到万正乡、甲山村，临桂大村、良丰、四塘、大圩，湘桂铁路沿线等地的伤兵医院、工厂、学

校、农村开展抗日救亡工作，通过工作实践，使每一位团员都得到了历练，也学到了许多在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和本领。

汪达之在《生活教育与新安旅行团》一文中说：“我们已经摆脱了半殖民式的学校教育和呆板的书本教育，我们从现实生活中，从救亡工作中争取现代的知识和技术，更以集体的力量来教育自己。所以，没有专门的教师，但我们的教师却随处可见，我们积极地培养自我批评的精神以及自动的力量，我们的生活会议和各种会议，就是我们很好的自我教育的机构；从这些会议里决定我们的工作，批评和纠正我们的行为和工作上的得失，从生活和工作中提取新的知识，进行集体的自我教育。”

不畏艰难困苦

为桂林抗战事业作出特殊贡献

在桂林期间，新安旅行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团员们过的是艰苦而又愉快的集体生活。1938年从长沙到桂林后，新安旅行团没

有固定经费，团员们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吃饭时年纪最小的先打饭，年纪大的最后吃，没剩饭就饿一顿。即便如此，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领导下，团员们从未停下抗日救亡工作。他们走到哪里，就把抗日救亡声音带到哪里。

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时，新安旅行团的经济来源不多，主要靠沿途给老百姓放映电影获得，其次是替书店、报社代卖书报取得一些辛苦费，再就是发动年龄大一点的团员为儿童报刊或其他报刊写稿。在从桂林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之前，为解决旅费问题，新安旅行团还专门组织了一个临时写作班子，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完成了6本书稿，交予桂林文化供应社编入《少年文库》丛书，出版社预付了1000元版税。直到1939年1月，经过周恩来、郭沫若同志的积极争取，新安旅行团才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特约”团体的名义，从政治部按月领取生活费和宣传活动费。

1939年，新安旅行团在桂林又吸收了一批新团员，规模扩大至近百人。在桂林期间，新安旅行团展演了反映儿童抗战的《春的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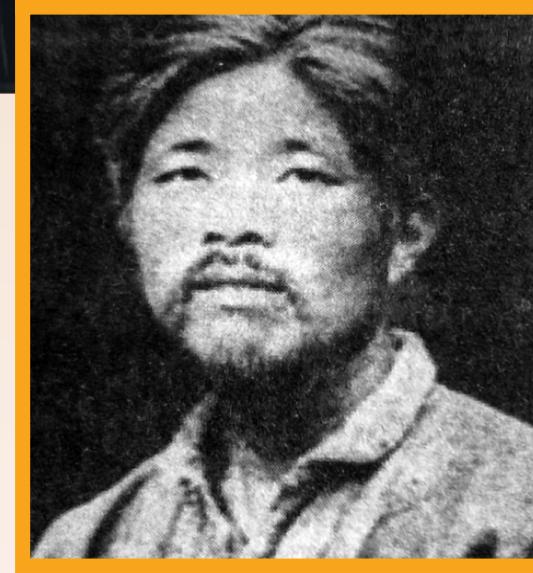
息》《两兄弟》《上海小同胞》等戏剧，和反映中国抗战前途的《中国的命运》。特别是大型抗日舞剧《虎爷》的演出，轰动了桂林全城。

汪达之早年在淮安新安小学任校长的时候，就和师生们同吃同住，他既是学生的老师、学生的兄长，又是群众的知心朋友。他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奉献给学校和当地群众，却从不在学校收入中支取一分钱的薪俸。为了民族解放事业，他始终和学生同甘共苦，陶行知视汪达之为自己的得意学生，特地写了“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表彰汪达之的奉献精神。

新安旅行团在桂林生活工作了两年多，由于局势恶化于1941年被迫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跟随新四军转战南北，开展少年儿童工作和军队的文艺宣传。如今，在桂林漓江东岸解放桥附近的小游园，立有一堵“新安旅行团桂林驻地旧址”纪念墙。桂林人民用这种独特的方式来纪念为抗战事业作出过特殊贡献的新安旅行团。



▲电视剧《阵地》中，汪达之与新安旅行团的团员。（视频截图）



◀汪达之。记者苏展翻拍